

习近平对外援助重要论述的研究^{*}

刘方平

【内容提要】 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交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教训以及新时代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转型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的理论之基、历史之维和时代之势。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具体表现为：“弘义融利”的援助价值观、“顶层设计”的援助格局观、“合作共赢”的援助理念观、“科学高效”的援助治理观、“授人以渔”的援助方法观以及“普惠平衡”的援助实践观。这些理论内涵构成了一套具有务实性、战略性、科学性和担当性的对外援助思想体系。新时代中国需要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积极践行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

【关键词】 对外援助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作者简介：刘方平（1990-），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南长沙 410083）。

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对外援助在推动援助双方外交关系发展，促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增添人类社会福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围绕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要求、新举措，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对外援助理论体系。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研究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对外援助的重要性，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产生的基本依据

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是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产生的理论之基，中国对外援助 60 多年的经验教训是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产生的历史之维，新时代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转型是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产生的时代之势。

1. 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

对外援助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对外援助的概念，但他认为，外来帮助对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之间应互相帮助。马克思明确指出：“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① 无产阶级要赢得解放，必须获得外来帮助，没有这个条件，一国无产阶级很难取得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研究”（18AKS014）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9页。

革命的胜利。所谓“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其实可以看作各文明国家无产阶级之间的互相帮助或援助。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言，互相援助与联合行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互相援助是联合行动的一种方式。在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开始注重彼此之间的合作与援助，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关于国际合作的思想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继承和发扬后，被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广泛认可和接受。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曾把对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运动的援助看作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随即展开了对外援助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加快自身建设的同时，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对外援助成为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大量的中国企业在对外援助的推动下成功地“走出去”，很多受援国通过援助加强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实现了共同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对外援助思想，他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中国对外援助新举措，这都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实现合作共赢。这说明，中国依然将对外援助视为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仍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为理论基础，是新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 历史之维：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教训

在对外援助的历史上，中国获得了大量宝贵经验，但也有很多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产生的历史之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来开展对外援助工作，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但有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迅速扩大，给中国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据统计，1972—1974年间，“援外支出占当年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均在6%以上”^①，以至于中国在不增加援外任务的情况下，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剩余援外任务。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中国还很穷，力量还不行，只有等自身发展好点，才能“花多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②。在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开始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支出，对外援助支出占当年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73年的6.904%下降到1980年的0.639%^③。虽然援外支出下降减轻了中国的财政负担，但也限制了对外援助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总体来看，对外援助在改革开放前后经历了两种方式：改革开放前，对外援助是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后，对外援助成为国家经济外交的一种手段，其重要性大幅度降低。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不能满足新时代中国对援外工作的新要求，中国对外援助迫切需要新的变革。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教训成为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产生的历史之维。

3. 时代之势：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转型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由被动应对全球挑战，转变为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塑造对外发展新格局。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中，对外援助能够发挥先导的作用。为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外援助需要承担相应的职责。从国际发展格局来看，目前全球发展合作形势不容乐观。自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无视他国合理的利益关切，频繁发动贸易战以保护本

① 《方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③ 参见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50—2010）》，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19—220页。

国利益,致使国际合作陷入新一轮困境。为推动全球治理,促进国际发展与合作,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为此,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加大对贫困国家援助力度的同时,带动其他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要对外援助发挥重要作用。国际国内环境的重大变化需要提升对外援助在国家外交中的地位,赋予其重要职责,这是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产生的时代之势。

综上所述,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理论思考和经验总结,我们需要深入理解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

二、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深入总结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经验教训后,对新时代条件下如何开展对外援助工作进行的理论思考。总体来看,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1. “弘义融利”的援助价值观

2013年,习近平访问非洲期间提出了正确义利观,它的提出有助于对外援助恢复其原有的“帮扶”色彩,而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无偿性、利他性是对外援助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提出的正确义利观,就是要求中国对外援助树立正确的援助价值观,在向其他国家提供对外援助时,“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①。“弘义融利”的援助价值观并不与中国过去提出的“平等互利”援外理念相违背。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平等互利”的援助理念仍将适合中国国情,但“弘义融利”的援助价值观强调,在中国提供对外援助的过程中,要坚持帮助他国为第一要务,让受援国真正得到切实的实惠。“弘义融利”援助价值观的提出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是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观。

2. “顶层设计”的援助格局观

虽然对外援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经过数次改革与调整,但依然面临系统性的改革难题。中国对外援助要承担起时代重任,迫切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来破解这些难题。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出发,既聚焦于解决中国对外援助存在的问题,又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的改革方向,展现了“顶层设计”的援助格局观。“顶层设计”的援助格局观坚持系统性改革路线,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对外援助适应国家整体发展需要。2017年2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此次会议强调,“要优化援外战略布局,改进援外资金和项目管理,改革援外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对外援助综合效应”^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首次提出要优化对外援助的战略布局,意味着中央将对援外工作进行“顶层设计”,以提升对外援助的综合效应,使对外援助在国家整体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3. “合作共赢”的援助理念观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能够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发出自身的“声音”,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

①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②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力亲为抓改革 扑下身子抓落实》,《人民日报》2017年2月7日。

的重要论述契合了时代的发展需求，提出了“合作共赢”的援助新理念。“合作共赢”的援助理念能够满足受援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主动掌握自身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愿望。“合作共赢”的援助理念超越了一般层次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强调通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努力，来维护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合作共赢”援助理念的典范，中国希望通过带动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塑造有利于沿线各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实现合作共赢。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只有坚持“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①。

4. “科学高效”的援助治理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构建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对外援助体系，但它也存在着战略谋划职能欠缺、独立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构建一套科学高效的对外援助治理体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在习近平“科学高效”援助治理观的指导下，中国从两个层面对援外体系进行了改革。在组织层面，打造独立化的对外援助治理体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实施意见》，该意见提出要改革援外管理体制机制，其目的就是要打造科学高效的对外援助治理体系。为贯彻此次会议精神，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统筹负责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标志着中国有了一套较为独立的对外援助治理体系，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治理体系独立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在制度层面，中国进一步完善对外援助治理制度。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援外制度补充和完善的力度。例如，2014年12月，中国开始实施《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对援外项目的立项、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制度化约束，推动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制度化水平。

5. “授人以渔”的援助方法观

在国际援助领域中，提升援助的有效性一直是各援助大国关心的热点话题。西方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仍然没有办法确保它们的援助能够有效减少贫困和促进发展。中国在国际援助领域经历了长达60多年的实践，早在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就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其中之一便是要“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②。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坚持对受援国发展能力的培养。习近平继承了周恩来对外援助思想的精髓，他多次提出，中国将继续扩大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坚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③。“授人以渔”的援助方法观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好国际社会提供的大量援助，但不能对国际援助产生依赖，摆脱贫困和落后的根本途径是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依靠他国。中国愿意分享自身发展经验，但更鼓励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授人以渔”援助方法观的精髓所在。“授人以渔”的援助方法观实际上是中国自身改革发展的努力在对外援助领域中的一种反映。为了践行“授人以渔”的援助方法观，中国设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其目的是根据受援国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援助，帮助受援国尽快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授人以渔”援助方法观的本质要求。

6. “普惠平衡”的援助实践观

“普惠平衡”的援助实践观来源于习近平提出的世界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④的思想。“普

①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

② 《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9页。

③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6日。

④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

惠平衡”的援助实践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纵向来看，对外援助要惠及更多的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从横向来看，对外援助的领域要尽量保持平衡，既要有经济援助，也要有民生和安全援助。在习近平“普惠平衡”的援助实践观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实践有了新的变化：首先，中国增加了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2015年9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①，以实现国际援助的“普惠平衡”。其次，中国增加了对受援国民生领域的援助力度。近年来，中国进一步平衡对外援助领域，逐渐增加对受援国民生领域的援助力度，争取让受援国民众得到更多的直接帮助。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在未来三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给受援国民众带来切实实惠^②。最后，中国增加了对安全领域的援助力度。随着中国逐渐认清对外援助的重要地位和职能，中国对安全领域的援助力度在逐渐提升。2015年，习近平访问非洲时宣布中国将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其中包括35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用于支持包括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在内的“十大合作计划”的顺利实施^③。在习近平“普惠平衡”的援助实践观指导下，中国对民生、安全等领域的援助力度有望继续增加，中国对外援助的领域将会趋于平衡，对外援助的综合效应将进一步提升。

三、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既着眼于世界发展格局的总体趋势，又立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和现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 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务实性

实事求是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的灵魂和精髓，是贯穿于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中的一条红线。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在实事求是分析中国对外援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实事求是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的最根本特征。一方面，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立足于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意味着中国需要将对外援助放在“合作共赢”的框架下，以适合中国的国情。另一方面，在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指导下，中国新组建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名称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将其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名称设置为“开发合作署”。虽然“发展合作署”与“开发合作署”只有两字之差，但“发展合作”与“开发合作”存在较多不同。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名称设置则体现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突出“发展合作”之意，目的是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符合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需求。

2. 以高瞻远瞩为标志的战略性的

战略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贯穿于习近平关

①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

② 参见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

③ 参见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5年12月5日。

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之中。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的战略性有以下几点表现：一是构建对外援助战略布局。习近平继承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对外援助思想，重新认识和确立了对外援助在大国外交中的作用和地位，将对外援助的战略布局统一纳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之中。二是推动对外援助与国家整体发展路线对接。中国的对外援助战略布局与“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互对接的。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①是分不开的。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交思想的组成部分，对外援助需要做好战略布局，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3. 以规范合理为导向的科学性

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是科学的思想体系。首先，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科学地反映了对外援助的基本规律。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教训表明，一个国家对外援助的支出总是要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受援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保持动态平衡。对外援助既不能成为援助国的财政负担，也不能让受援国形成援助依赖。因此，加强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提高对外援助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是援助国要完成的基本任务。我国筹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来统筹对外援助工作，体现了我国加强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提高援外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尊重对外援助的基本规律。其次，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的科学性体现在它能够解决中国对外援助存在的问题。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有助于解决援外体系“碎片化”问题，对现实实践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最后，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对外援助发挥作用，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科学地预见到对外援助将要承担的职责，它不仅提升了对外援助的地位，而且还平衡了对外援助领域，为对外援助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空间。

4. 以共同发展为使命的担当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对外援助的问题上相对比较“低调”。由于底子薄、基础差，中国在过去一段时期都是接受外来援助较多的国家，而对外提供的援助相对较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履行相应的大国责任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经济合作面临新的困境。为了展现中国的责任担当，近年来中国逐步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习近平在各种国际场合相继宣布了一系列中国对外援助的新举措，展现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使命担当。在国际社会中，这种担当精神和使命感的具体表现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为此，习近平提出中国要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使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让沿线国家“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②。从援助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的一款公共援助产品，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目的是为了实现与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为全球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展现出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以共同发展为使命的担当性。

四、新时代践行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的路径

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交思想的组成部分，与

^①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② 参见《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 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人民日报》2016年8月18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形成一种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关系。新时代践行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的路径需要与国家整体发展路径结合起来，形成共振，共同增进国家利益，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1. 优化援外战略布局，服务“一带一路”

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强调提升对外援助的地位，将对外援助内嵌于国家发展大局之中。从历史上看，对外援助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革命与战争年代，对外援助是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对外援助成功地配合了国家的外交路线。从现实看，对外援助深处“一带一路”建设第一线，能够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历来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国，中国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沿线“深耕已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新时代践行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就是要充分发挥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建设第一线的优势和作用，带动其他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项目的前期考察、项目评估、合作建设等环节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未来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布局要聚焦以下“三个重点”：一是重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将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这个重点体现在援外政策和资金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沿线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更需要重点国家发挥“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的作用。中国对外援助向“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聚焦，既可以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可以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带动整个地区其他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二是重点行业。中国对外援助要向“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行业倾斜，注重发挥对外援助在教育、民生等行业的影响，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更好地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在重点行业内的援助与合作，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三是重点项目。改革开放前，坦赞铁路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金字招牌”，是中非关系的“一个象征符号”^①，中国至今仍在享受着坦赞铁路带来的政治溢出效益。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将转移至“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对外援助需要打造新的“金字招牌”。这种“金字招牌”项目不再需要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要以产生持续良好的国际影响和综合效益为主要目的，以此来提升中国形象，带动各国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2. 提升援外综合效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对“善”生活的渴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②，“善”是社会团体的价值追求，而城邦则是追求“善”的共同体。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在对“善”追求的过程中产生了城邦、国家等共同体形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态不仅是“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③，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不是值得追求的。马克思所认为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能够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保障，这种共同体生活才是“善”的，是值得追求的。根据目前人类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过渡还存在较大困难，但这并不妨碍人类社会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这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加均衡，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能够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贫穷和落后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减少，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不应当被进一步拉大，世界大国需要尽到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帮助落后国家实现发展，保障个人自由和发展的基本权。

① [美] 查尔斯·斯蒂思：《中非关系：美国视角下的简要评估》，李娇译，《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径有很多，对外援助便是其中一种。中国向落后国家提供卓有成效的对外援助，能够减少贫困，促进发展，有利于保障这些国家人民的基本人权。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对外援助一直在追求实现双边合作共赢，中国通过援助带动落后国家参与全球分工与合作，实现共赢发展，有利于人类社会形成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践行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不能将对外援助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而要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提供卓有成效的援助，提升对外援助的综合效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帮助。

3. 承担大国责任，推动国际援助合作

新时代践行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需要中国承担起相应的大国责任，加大对世界公共援助产品的供给，推动国际援助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国际社会一直呼吁中国承担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对于这个问题，中国需要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能力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产品，这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目前，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愈发重要，适当提升对外援助支出比重，承担合理的大国责任，不失为一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明智举措。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建设阶段，中国对外援助势必会迎来一个新的增长期，这既是中国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的主观要求，也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由被动应对全球挑战转变为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如今，中国已经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在援助体系的设置方面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保持基本一致，这为中国参与国际援助合作提供了良好的体系保障。中国要善于参与国家间援助合作，传播中国对外援助理念，争取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利用国际社会的整体力量，解决全球贫困和发展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 [2] 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3] 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
- [4] 刘振江：《论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 [5] 唐丽霞、李小云：《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演变与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7期。

（编辑：黄华德）